

面對台灣的危機，NGO 的策略與行動*

施正鋒

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
兼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

社會運動團體與政黨的關係

自從 1980 年代以來，台灣的反對運動一直在調整路線，由早期「議會路線或是社會運動路線」的爭論，後來「政治運動社會化、社會運動政治化」的講法，到目前社運界幾乎是沒有利用價值的情形，我們如何從學術的觀點來作分析呢？

在政治學裡頭，我們可以從研究政黨、社會運動、或是利益團體的文獻來作出發點。基本上，上面所講的變化，可以視為政黨與社會運動團體(或是利益團體)兩股力量相互競爭的過程：一方面，政黨當然會盤算如何吸收社會資源來壯大自己；另外一方面，社會運動團體也想要辦法來維持自己的自主性。

站在政黨的立場來看，為了要維持組織上的穩定性，一定要考慮外在環境的力量，如何來定義自己與環境的關係，以便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(uncertainty)。簡單地說，政黨有兩種作法：不是去適應(adapt to)環境，就是要去控制(dominate or colonize)環境。

我們來看民進黨就好，他們大部分的人是早期那些反國民黨人士的結合，這些有頭有面的「黨外人士」，就是目前各派系的頭人。另一股勢力就是現在的「新潮流系」，他們當時沒有什麼社會地位，也沒有什麼政治力量，當然要找新的社會力量來做靠山，也就是高舉著「關懷弱勢」的社會運動大旗，用「改造社會」的正當性來鬥爭老一輩的人，比如老康與美麗島系，儼然把自己變為正義的化身。從這裡來看，我們就不難了解為何美麗島系如此痛恨那

* 演講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總會主辦「台灣國是會議」，新竹，新竹聖經學院，

些社會團體，認為他們只不過是新潮流系的鬥爭工具。

相對的，我們也可以說新潮流系是吸收社運的營養來壯大的；若沒有社運，就沒今天他們在組織上與選舉上的發展。只不過，新潮流並不滿足與社運互相配合的關係，他們甚至進一步要去控制社運團體。講坦白一點，我們此刻所看到的社運團體，大部分是新潮流直接或是間接促成而產生的（formation），他們進一步主導理念走向（indoctrination），並且要動員（mobilization）這些社運的成員或是其同情者來支持。

政黨若將社運團體視為外圍組織（auxiliary group），等於是將社運團體當作傳達政黨決策給外部環境的工具（transmission belt）。不過在表面上，政黨的作法會比較細緻一點，不會對外公開其支配性，因為社運團體若要有影響力，至少在表面上要讓人看起來有自主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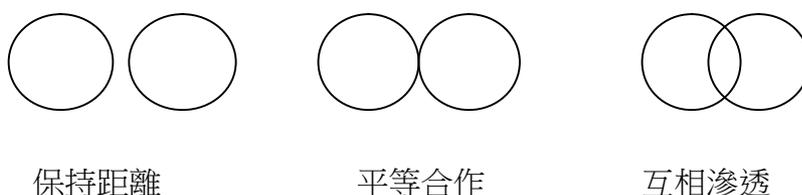
政黨控制的手段有兩種：一種是用滲透的方式，或是灌人頭；另外一種比較粗暴的方式是收編，由社運裡面的成員去找具有政治企圖心以及聽話的人，想辦法用公職來交換其配合。社運團體頓時變成執行政黨、甚至是派系決策的機器。

一般來說，他們的目標是社運團體內有實權卻不用負擔責任的職務，比如說秘書長、會計、或是財務；如此一來，他們就可以運用人事權來掌控資源。當然在表面上，它們會找有頭有臉但是又沒有行動力的人來作傀儡。等這些團體的資源用得差不多了，或是成員開始發覺其技倆，令其無法再上下其手時，他們的手段就是聽任其潰爛，或是使用批鬥的方式。反正，他們的想法是「如果我們吃不到，別人也不要想吃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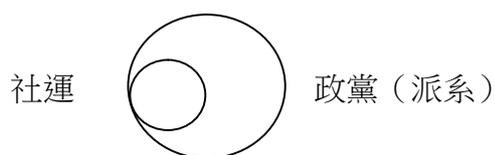
最近幾年來，民進黨漸漸習慣議會路線，派系間雖然勇於內鬥，但是它們至少有一個共識，就是對社運興趣乏然，比較關心的是要如何來執政，已經比較不喜歡強調「改造社會」、「進入體制、反體制」那些口號，社運人士當然會感覺到似乎是被人拋棄了。

總而言之，表面上兩邊的關係會惡化，好像是因為路線不同，比如議會（選舉）或是社運路線，要用體制內或是體制外的方式，民進黨的定位是執政或是獨立建國，配合現實（捐客黨）或是堅持理想（使命黨）。說來說去，我們都可以看作是民進黨想要調整其與環境的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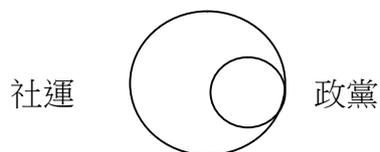
從邏輯來看，社運團體與政黨的關係有三種可能：一種是保持距離，田無交、水無流；第二種是保持平等的合作關係；第三種是互相滲透。我們可以畫成下面的三個圖：



若要社運與政黨沒有往來，在現實上比較困難，因為若不參與選舉，資源就無從而來；但是若要選舉，就沒辦法避開政黨。過去，政黨與社運團體有如兄弟一般，無論是在人員、資源、或是理念上皆相互交流，不分你我。但是實際上，往往是社運被政黨（或是派系）使用「隱藏式的帝國主義」（disguised imperialist）方式吞噬，就好像下面的圖：



面對這種手段，社運人士相當不甘心，甚至感覺到政黨應該是社運要實現理念的工具，好像下面的圖：



我們來看英國的工黨，當初它出現的時候，的確是被當為勞工運動的工具，必須聽勞動者的話。但是由民進黨出現到現在，社運團體老是當人家的

神主牌。兩邊的意見若相同時，到底誰是老大，不用太計較；但是，若社會團體堅持要主導一切，那麼，誰是老大就一清二楚了。難怪民進黨會嘲諷，有辦法就去組黨，不要一天到晚吵得要命。

從民進黨的觀點來看，它們的人選或是政策若有社會團體背書，當然是會比較有正當性，而且也可以擴大社會支持。但是，與任何組織一樣，它必須防止外來的影響、挑戰、或是控制，那有乖乖地被人操縱的道理？

政治是最勢利眼的，大家若有合作的空間，當然是可以相互結合；過去，政黨若要利用社運時，會講得很好聽，說什麼「分進合擊」，再利用什麼「剪刀理論」來誑人。但是政治上並沒永遠的朋友，尤其是在利益衝突時。對民進黨來說，社運團體就好像保險套一般，用了就丟掉，講什麼情，講什麼義，徒落人笑柄罷了，還癡想要作別人的太上皇？俗話說，「作戲仔 kong，看戲仔憨」，別人演戲的想要散棚了，看戲的卻不放人，不知是要怪誰呢？

其實，任何社運團體（或是利益團體）本來就不應該與任何政黨糾纏不清（partisan），應該是儘量與大家保持關係（access）。畢竟，政黨關心的是執政，政治人物關心的是選票，我們有多少選票或是捐款，它們就會作多少事情，不要寄望講他人會努力替我們打拚。

社運團體不要「自我膨脹」，一心想要監督政黨；「veh 吃就愛自己去討賺」，不要抱人家的大腿，要想分人家的公職，人家生食已經不夠了，那有可能再分給你？進一步來說，畢竟玩政治是要全心全意地投入，不是玩假的。

若要別人看得起，自己就要有自主性（autonomy），也就是要先有自己的目標，自己要作打算，為自己所作的決定來負責。同時，大家也要拒絕外力的操控，排除誘惑；如果作不到，只會讓別人看不起。

若是看到志同道合的政黨，大家可以針對議題來作選舉或是立法上的聯合陣線（united front），甚至可以作長久的合作或是結盟（coalition）。但是，不管如何，兩邊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，不分你我那一個比較大。

秀才不能只會喝良心湯

由於民進黨連續兩次重大挫敗，不少人預測在明年縣市長大選之後，應該會有政黨板塊變動的空間，因此，不論是藍綠，都有另外籌組新黨的呼聲。然而，由過去的經驗來看，不論是新黨、建國黨、親民黨、還是台聯黨，大體逃不過「秀才造反、三年不成」的宿命。誠然，深思熟慮未必能擺脫結構的制約，然而，如果只是政治嗅覺很好，光是隨著感覺去走，絕對是成不了大事。

大體而言，一個政治團體的成立，必須先對於本身的角色下定義，然後，才有可能進一步設計組織上的屬性。我們必須要指出，這絕對不應該是一個社會運動團體，因為，就定義上來說，社運團體的目標是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來進行社會改造，頂多根據理念，支持、或是配合政黨運作，本身並不直接參與政治。

在過去，我們看到，台灣的社運團體往往淪為政黨的外圍組織、或是個人進入政治場域的工具，不足為訓。民進黨在野時期，社運團體基本上是新潮流寄生的宿主，一方面可以安插人員進駐，既可以吸血滋補、又可以主導發展，另一方面，有可以增加流員的社運資歷、方便參選的包裝。

在民進黨執政後，社運人士大量進入政府體系，講好聽一點，是進入體制進行改造，因此，應該要感謝民進黨的青睞。然而，不知是無能、還是怠惰，一旦進入大染缸之後，上焉者任憑官僚體系擺佈，把衙門當作招待鄉親的景點；下焉者，不管是政務推動、還是人事安排，只關心逢迎主子、拉幫結派，忘了理想為何物，甚至於還要教訓昔日的同志要務實一點，必須把國王的新衣掛起來。

就光譜的一個極端而言，如果自許為社會清流的社運人士，此回要玩真的，一開頭就朝政黨的方向作規劃，只要時機成熟，經過改名、甚至於不用改名，馬上可以參加選舉。也就是說，這是一個名稱不叫政黨的政黨。

另一個極端是當作一個論政的平台，讓對於時政不滿的圈內人士抒發己見，也就是具有集體心理治療的功能。如此一來，這個論壇比較像是目前扶輪社等團體的固定聚會，大家輪流請客吃飯、聯絡感情，甚至於願意每年繳

交昂貴的年會。不過，既然只是一個社交的俱樂部，對於成員不方便有過多的期待，罵完老共、再幹醜國民黨，還有民進黨可以調侃，彼此相濡以沫，明天太陽還是會出來，大家的日子還是要過。

屬性介於兩者之間的是類似於英國的一些社會主義團體，尤其是一般人聽過的費邊社，本身是由知識份子組成的社團，一方面關心勞工運動與工會的運作，另一方面又與工黨關係密切，甚至於以間接黨員的身分，參加其黨員代表大會。這種問政而不參政的模式，好處是不用擔心被政黨收編，當永遠的在野份子；只不過，萬一眾人只是喝喝良心湯，既不出錢、也不出力，更談不上專業上的奉獻，比馬英九的不沾鍋還糟糕。

請民進黨放社運一條生路

馬英九總統五二〇上台，迄今百日，不只「馬上好」的神話被戳破，整個五院政府裡頭，除了院長還沒有換人的考試院以外，幾乎忙著對民進黨政府進行獵巫運動，特別是假借著肅貪的名義，對於前總統陳水扁一家猛追窮打，幾乎已陷入瘋狂的狀態。

在這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時候，本土社團發動八三〇嗆馬大遊行，表達選民對於物價上漲、百業蕭條的不滿，同時，也要給劉兆玄內閣當頭棒喝，沒有頭緒的所謂擴大內需方案，不僅無法產生政府開銷的乘數效應，反而會製造更大的通貨膨脹壓力，給中下階層的老百姓帶來雪上加霜的負擔。

我們可以看到，由當選總統到現在，除了明確的「經濟靠中國」政策，不論是內政、或是外交，部會首長忙著調整人事，幾乎無人關心國家大政，所謂的「我們準備好了」，只不過印証一個事實，在野八年的國民黨，飢不擇食的醜態。這一切都要作為國家領導者的馬英九總統赴所有的責任。

所以，這次抗議活動的對象，當然是被民間譏為宅男的總統馬英九，希望他能在跑步、裝可愛、以及秀英文之外，能更勇敢地站出來，不要囿於所謂五權憲法的窠臼，而是要正面領導國家政策的擘劃。

不過，在人民積極準備北上發聲之際，我們卻看到有些逆流湧現，令人

擔心是否會模糊這次活動的焦點。首先，泛藍媒體把嗆馬詮釋為挺扁，試圖貶抑抗議的正當性，也就是說，原本是人民對於生活困頓的不滿，一旦被定調為替陳水扁家族出一口氣，那麼，在藍綠對峙的氛圍下，那麼，即使再名正言順的訴求，最後只會淪為朝野對抗中洪流的淹沒，雷大雨小，枉費民間社會孤心苦詣的動員。

我們以為，陳水扁的海外帳戶事件，應該交由司法單位處理，毋枉毋縱，不應該有透過民粹來影響辦案、還其清白的期待。因此，當我們聽到諸如「台獨金庫」的說法，只能搖頭歎息，深感不解，為何所謂的泛綠輿論領導者，竟然會有如此為了袒護而冥想出來的託辭。我們必須指出，不管終極目標為何，只要是前金、或是後謝，都與我們追求的理想不符，絕對不能合理化程序上的過錯。

是的，與阿扁切割是必要的。因此，我們絕對不能容忍個人的溫情主義，將遊行活動當作對於陳水扁的雪中送炭。同樣地，我們以為在過去八年有所虧欠陳水扁政府的人，在利益衝突的嫌疑下，不應該介入活動的主導，以免被解釋為假公濟私，藉機會在還人情。

在民進黨方面，表面上，中央高層與地方基層有不同的思維，前者思考如何保持距離，後者盤算明年縣市長選舉，總歸一句話，就是工具性的考量。我們以為，兩者都不是正人君子之風，因為在此亂局當頭之際，如果還是在算計如何發國難政治財，徒然呈現器量不足的窘狀。因此，與其斤斤計較與阿扁切割與否的得失，倒不如完全放手，讓選民自發性選擇是否用腳表達抗議。

我們一直百思不解的事，為何如果沒有透過地方政治人物，民間就無法進行動員？我們同意，從報名、租車、到餐費，無一不是需要用錢。然而，民主就是一種參與，如果我們連這些錢都不願意犧牲奉獻，又如何能怪罪國民黨怪獸長期宰制、任憑地方政客以小利羈縻升斗小民？

同樣地，民主是一種學習。如果我們長期仰賴政黨、或是政治人物安排一切，到頭來，「軟鞭牽豬」，我們將不只無法訓練獨立思考的能力，甚至於

會淪為四體不勤的稻草人。因此，我們也要問，民主化二十年來，除了汲汲於選票的政客以外，我們在地方上，就沒有辦法培養出任何具有自主性的社會力量嗎？

最後，我們更要提醒大家，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以無私的態度前來，不應該讓任何政治人物有收割的遐想。因此，如何厚植組織的力量，在未來適時站出來，最大的基本前提，就是取信大家，除了說背後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左右，主事者不會向政黨投懷送抱，更不應該有藉機壯大的幻想。怒吼過後，讓大家平安順利回家。

本土社團何去何從

自從民進黨一連輪掉立委選舉、以及總統大選，一向與之交好的本土社團斷然失去實踐理念的盟友。經過最近幾次大型遊行、以及造勢場合，眾人漸漸恢復元氣，不像先前搬垂頭喪氣，不過，究竟要如何重新出發，似乎仍然茫茫然，有待大家進一步深思。

如果說國民黨與利益團體共生共榮，作為反對運動出身的民進黨，在那戒嚴噤聲的時代，既無資源、又缺人手，當然要尋求社會運動團體的奧援。因此，我們看到民進黨的動員訴求，除了國家定位上的台灣獨立、以及族群正義上的台灣人當家做主，為了擴大社會的支持層面，社會改造是大家都可以找到歸屬的最大公約數，也就是要把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權拉下來。

在民主化的過程中，社運團體民進黨同步成長、交叉滋養。在後美麗島時代，當島內異議份子飽受國民黨政府打壓之際，海外成為驚弓之鳥暫時休養的庇護所，甚至於接受抗爭訓練。即使在民進黨成立之後，託身北美洲的台灣同鄉胼手胝足，儼然是最大的競選經費來源。

曾幾何時，當民進黨政治版圖在擴張之際，內部對於社運團體開始有南轅北轍的看法。對於美麗島系以及日後衍生的正義連線、福利國連線，這些社團彷彿是新潮流系的外圍組織，除了以道德的光環來鄙視議會路線，只會搶食立法委員、以及國民大會代表的不分區席次，食之不甘、棄之可惜。

相對地，新潮流原本以社會運動路線龍頭自居，本身對於黨籍公職人員大加撻伐，當然要對社運團體極力拉攏，甚至於吸納收編，無所不用其極。長久以來，不少社運團體與新潮流水乳交融、相互滲透，根本看不出自主的面目，甚至於配合派系的精算，一再介入民進黨的內部鬥爭，無役不與。

福兮禍之所伏，當一些社運團體領導者對於政治遊戲樂此不疲、任憑新潮流操弄之際，雖然個人一時取得榮華富貴，卻自甘派系打手，明眼的成員當然因為大失所望而逐漸自我流放，而社會上潛在的生力軍自然裹足不前，大廟一轉眼淪落為乏人問津的暗巷小壇，令人惋惜不已。

在陳水扁於兩千年贏得政權之後，在頻繁更動的內閣改組中，不少社運份子獲得論功行賞，有機會進入中華民國體制走了一回。上焉者，戮力實踐當年對支持者的承諾，無奈，卻因為為政者高舉選舉至上的巨擘，當年的理想一一被束諸高閣，最後只能黯然下台。

下焉者與政客沆瀣一氣、狼狽為奸，不只學會討好官僚，甚至於視政見為國王的新衣、嘲弄昔日的同志不知變巧。此時，道德淪喪的知識分子必須競相投靠派系，社運資歷彷彿九品中正。當非新潮流派系也學會扶植社團之際，已為社運的發展埋下喪鐘。

如果說社運團體與政黨要保持距離是不食人間火，那麼，如果不能馴服政黨，至少也要保持本身的自主性，選擇議題做個案式的合縱連橫。尤其是在面對民進黨墜入酒池肉林而無法自拔之時，即使無力發揮振聾發聵之效，還是應該要痛下針砭，對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
在選舉潰敗之後，我們看到社團開始著手整合，也順利舉辦多次抗議活動。不過，我們以為，在百姓宣洩了對於馬英九政府無能的不滿之後，還是會期待再下回大選中，有更正面的對策來取而代之，那麼，除了善於打選戰的民進黨以外，社團應該重新思考本身可以扮演何種角色，畢竟，不能老是寄望以施打類固醇的方式來改善體質。

我們以為，各個社團應該回到初衷，回想自己的草根何在，才有可能在選舉中以自己可說服的選票，來要求政黨言聽計從。否則，如果繼續充當動

員的打手，那麼，就與地方上的樁腳無異，差別在人家靠的是人脈，自己仰賴的是看不到的空氣票。

維持自主性是社運團體生存的不二法門，不要仰人鼻息，切勿急功近利，才不會讓政黨瞧不起。如果說學者文妓是丟臉的事，社運界投靠政黨也是不光采的。經過多年的沉淪，應該是檢討自己、重新站起來的時候。伙伴們，共勉之。

社會運動不是在野黨的營養針

在那遙遠的時代，運動與議會是水火不容的兩條路線；前者似乎是代表著奉獻、以及清高，後者則意味著享受、甚至於出賣原則。在這樣的二元對立框架下，少年的寫手對黨外出身的公職人員發動慘烈的批鬥，好像進入體制就是十惡不赦的罪人。

在民進黨成立以後，對於缺乏經濟資源、以及政治權力的在野黨來說，社會運動團體對於弱勢者的關心，正好可以提供不用本錢的正當性。不管是充滿理想的年輕人、尋求心靈慰藉的中產階級、或是自我流放的海外留學生，初試啼聲的社運，起碼代表著社會良心的光環。

曾幾何時，當模仿「打著紅旗反紅旗」的「進入體制反體制」朗朗上口，「雞兔同籠」齟齬的逐漸消逝，政黨就必須重新考慮社會運動團體的意義。當選舉與社運不再相互排斥之際，打著運動經驗的民進黨候選人，也就是具有「運動性」，儼然是一種經過上人加持的純正血統。

在人際關係疏離的都會地區，離鄉背景的讀書人面對茫茫大海，特別能感受到社運訴求的救贖。也因此，有很長的一段時期，會不會「作運動」，彷彿就是民進黨甄補人才的最高道德標準。此時，街頭衝撞就是社運的同義詞。所謂的「剪刀理論」，基本上就是倚賴群眾力量來抗衡國民黨在議會的多數暴力。

既然社運成為進入政治場域的入場券，在野黨有兩種接觸的途徑。比較

踏實的作法是由零開始，在既有綿密的國家組合主義控制下，想辦法建立自己的灘頭堡、或是派人前往打入；再不然，就是在現有的友好團體之內，尋覓有政治企圖心的領導者，以不分區國大、或是立委位置來拉攏。不管如何，社運淪為政黨的外圍組織，沒有尊嚴可言。

因為「當家不鬧事」的想法作遂，民進黨執政以後，社運成為尷尬的負面記憶。有些社運人士受邀進入政府，上焉者嘗試著實踐當年的理念，不過，多半被認為不識時務而倉皇下台；下焉者個人享受革命成果，與舊勢力沆瀣一氣、樂此不疲，甚至於嘲弄昔日的戰友缺乏社會滲透力。對於絕大多數的社運參與者來說，烏盡弓藏、兔死狗烹，只能怪自己沒有吸納選票的能力。

民進黨下台以來，支持者冷眼旁觀，就是要看這些政治人物是否能反躬自省，包括政黨的自我定位、以及組織改造，尤其是如何走出派系傾軋的宿命。然而，當蔡英文主席豪氣地將今年訂為「社會運動年」、宣佈設立「社會運動部」，只是宣示手段的調整，還是沒有新氣象。

新正年頭，我們不禁擔憂起來。一來，民進黨還是將社會運動當作街頭運動看待，而非以非體制的方式來從事社會改造；二來，近年來社運團體慘澹經營，政黨又要將社運當作醞釀政治動力的工具。